

尼泊爾國王爲何訪問西藏

廖淑馨

山國——尼泊爾由於地理使然，大自然賦與它的是介於印度及中共間的戰略要勢。然而，由歷史的淵源而言，尼、毛關係不若尼、印之密切；就文化關係看來，亦復如此。

尼泊爾本身的窮困貧瘠是造成對印度在經濟方面完全依賴的原因。因此，在內政和外交自然也頗受印度的影響。然而，去年（一九七五）印度吞併錫金後，重重地影響到尼泊爾對印度的信賴心。引起尼泊爾不安及猜疑的是：是否印度將以同樣手法對付尼泊爾？而中共一向視尼泊爾爲對抗印度勢力的重要據點，同時也是中共擴充在南亞的勢力的踏腳石，基於這個原因，中共利用機會爭取尼泊爾自是不遺餘力。

尼泊爾今天已成爲中共和印度由暗爭而至明鬥的拉攏對象。雖然，尼泊爾一向標榜其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但尼泊爾是否能在匪、印之間保持其「相等距離」的「平衡友好」關係，確實是一值得注目的問題。去年（一九七五）傳出了尼泊爾有走向共產主義的可能性①，更加深這個問題的玄奧性。今年（一九七六）元月，印度外長查萬（Y. B. Chavan）奉命赴尼泊爾活動②，爲毛、印爭奪尼泊爾的明朗化拉開了序幕。六月二日，曾先後於一九六六及一九七三年訪問中共的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第三度往訪更可以說明這場爭奪戰似已達到白熱化的階段。當然，比蘭德拉國王此行對尼、毛關係的變化自是一不可忽視的變素。

一 尼泊爾的不結盟政策

當毛、印雙方因邊界問題爭執不下之時，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提出的「不結盟政策」是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爲處在南、北兩強鄰間要維持生存，莫過於以友好態度對待他們爲上策。尼泊爾前總理比斯達（Kirt Nidhi Bis

ta）曾強調在亞洲動盪不安的局勢中，尼泊爾堅守其中立的外交政策，並且要求印度軍隊撤退及沿西藏邊界設立無線電台等等③。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馬亨德拉國王在尼泊爾全國評議會第十六次會議上重申繼續執行和平中立的政策，並說明：「尼泊爾的對外政策是在不結盟與和平共處的基礎上保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鞏固民族獨立並促進世界和平④。」自一九七〇年開始，毛印關係逐漸由緊張而趨於緩和。比蘭德拉國王（King Birendra）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仍就該國的不結盟政策表示其深信此爲增加和平的前景，並建議宣布尼泊爾爲和平區⑤。尼泊爾屢次強調其不結盟的外交政策，表面上似乎不受毛印關係改善與否的影響。只是，我們可以了解此僅僅是介乎強鄰間的小國自求生存應變方法。試想，在毛印關係尚未有肯定的發展之時，尼泊爾的態度當難於表明。因爲，不管尼泊爾偏袒任何一方，除非它所站的一邊永遠是較強的一方，否則一旦勢弱，則它會遭受魚池之殃。當然尼泊爾不會不識時務，更何況目前毛、印兩方都擁有核子武器。再說，尼泊爾的戰略利用價值無疑是毛、印雙方竭盡所能欲獲全部的箝制權利。因此，任何一方的疏忽，勢必造成另一方的有隙可乘。尼泊爾就是要利用這樣的「遊戲」謀取其自身的生存。基於這個原因，如果它能堅守其不結盟政策自然是明智之舉。然而，在實際上不結盟政策的實行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因爲，尼、毛及尼、印的關係就歷史及文化而論，根本上就存在着差異。加上毛、印二強鄰洞悉經濟是尼泊爾最弱的一環，他們各懷鬼胎，未曾放鬆過以經濟援助來討好尼泊爾。因此，不結盟政策在客觀上雖有優點，但主觀上，尼泊爾是很難達到其欲以相等的友好態度來對待中共及印度的目的。

傳統的尼、印密切友好關係確實在五十年代使尼泊爾處在兩強鄰的威脅邊上，表現出較傾向於印度。然而，七十年代的今天，尼泊爾總理吉瑞（Tulsi Giri）却提出解除與印度合作的政策，雖然他表示只是不希望以其任一

鄰國制衡或抗拒另一鄰國，並非有意傷害印度的利益。但他同時指出尼、印兩國的關係只是一種根本的施與受的友誼。這確實是句耐人尋味的話。事隔月餘，吉瑞訪問印度時發表談話，曾再申王國對印度及中共關係友好之類的话，但而後，他却又表示在尼、印的雙方關係上有一些固定的「特別因素」⑦，其所謂的特別因素即指的是尼泊爾同意其人民加入印度軍隊。而尼泊爾從未允許任何國家以尼泊爾人來補充其軍隊的人員。由這件事的特殊性，人們無法否定尼泊爾表現出的傾印心理。但是，由吉瑞總理前後矛盾的談話，却又叫人懷疑其傾印的可靠性。

顯然的，在尼泊爾與印度的關係時而表示牢不可破，時而又表示有問題的同時，尼泊爾境內的激進派已藉機有所行動。譬如：一九六〇年馬亨德拉國王與國會發生衝突，國王下令解散國會，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尼國政情不穩時，游擊隊即利用暴力迫使國王恢復民選政府⑧。倘若，單單是尼泊爾本身的激進份子藉此機會而壯大其勢力，則似乎有限。如今，北鄰的中共早已垂涎尼泊爾有利用價值的戰略地勢，想藉以謀求其在南亞勢力的擴充，自然是正中下懷，順着有利的情勢，不遺餘力扶植尼國境內的偏激份子的成長。

儘管尼泊爾政府早已申令阻止政黨在其境內的活動，但自一九六九年起，學生活動却受到尼泊爾國會黨及尼共毛翼的支持。起初，國會黨在若干大學控制了學生會。但一九七〇年間學生示威活動增加⑨，毛派也就在這一年控制了更多的大學⑩。由點擴充到面的控制，一向是共黨滲透的技倆。這同時說明了中共利用黨為工具漸漸地在尼泊爾發展其勢力。中共的這番用意是可以瞭解的，尤其是在毛、印邊界衝突的談判破裂之後。然而，尼泊爾面對着這個局面，明哲保身當然是它求生存的一個策略。而且，我們也相信尼泊爾在其國內經濟極端貧困之時，決不至於敢與其兩大強鄰分庭抗禮。目前，尼泊爾所希望的不過是在南北兩強對峙中自身的安全。至是馬亨德拉國王倡導的不結盟政策，是表明尼泊爾左右為難的處境。我們更可預見只要毛、印任何一方稍佔優勢，那麼這種利用強鄰之間的矛盾，想在夾縫中求取和平共處的政策，將會面臨重大的考驗。

這種考驗不僅尼泊爾懼於面對，而再三聲明其中立的态度。即令中共及印度，雖然暗地裏利用尼泊爾的不結盟政策為掩護，繼續為各自的國家利益打算，以各種方式求好尼泊爾，但仍舊希望尼泊爾能够行其中立的政策，以

抵制對方在尼泊爾的得勢。因此，今年（一九七六）元月，印度外長查萬赴尼活動，尼泊爾總理吉瑞也在印度做了一次訪問後，四月三十日，中共宣佈偽總理華國鋒邀請比蘭德拉國王訪問北平的消息這一事件足以說明了毛、印雙方對尼泊爾的敏感。尼泊爾的報章稱比蘭德拉國王的這次訪問是「尼、印關係斬新的一頁」⑪。究竟比蘭德拉國王的訪問能為尼、毛之間的關係帶來何種前途？

二 尋找經濟援助

繼印度、美國，中共在經濟援助尼泊爾的國家中居第三位。以一九七三年以前的情形衡度，中共與印度相比較，自然是略遜一籌。每年印度以一千萬美元援助尼泊爾⑫。然而，中共雖然早自一九五六年與尼泊爾建立經濟關係，由於文革期間，中共停止了對尼泊爾的經援，因此到一九七二年為止，中共經援尼泊爾僅九千八百七十萬美元⑬。平均每年不過六百多萬美元而已。

尼、匪的經濟關係有了轉機是由於尼、印的經濟關係發生齟齬。尼泊爾直至今天仍是世界上低國民所得的落後國家之一。為了發展它的落後經濟，為了維持它的獨立國的地位，尼泊爾勢必要吸進大量的外援⑭。一向它的經濟依重於印度，即貿易一項就可說明：尼、印的貿易額占尼國對外總貿易的百分之九十⑮。然而，尼泊爾財政及外交部部長拉吉班達瑞（Gelenet Bahadur Rajbhandary）却於一九七〇年七月抱怨印度未竭盡力量以迎合尼泊爾的經濟需求⑯。一九七二年，比蘭德拉國王也提到該國經濟改革之事⑰。雖然未見到其所提出具體實施的辦法，但在尼、印之間已顯現磨擦之時，猜測尼泊爾意圖減輕對印度的經濟依賴，尋求另一強鄰的經濟援助；抑或努力求取經濟自主是非常合理的。

一九七二年開始，尼、匪的經濟關係有了顯著的變化，譬如：該年的十一月十八日，中共破天荒地給了尼泊爾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⑱，等到一九七三年年底，比蘭德拉國王二度訪問中國大陸，使得尼、毛的經濟關係更加明朗化了。雙方在這次會談時除商榷相互貿易的問題外，尼泊爾同時還要求中共提供幾項建設計劃的援助，其中之一即靠近博卡拉山莊（Pokhara Valley

具有五千瓩能量的穆辛德 (Musimunde) 水利工程¹⁹。次年(一九七四)的五月, 尼、匪雙方談論簽訂新貿易協定以取代一九六八年所簽的協定, 其目的仍在於發展尼、毛間的貿易, 但重點放於西藏地區的陸地貿易²⁰。根據印度時報的報導, 一九七四年, 尼泊爾由中共輸入價值九千萬尼泊爾幣的貨品, 這個數字超過了一九七三年入口的百分之三十三。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這一供應尼泊爾需求的水泥、鐵纜以及紙張並取替了印度在尼泊爾的地位²¹。

一九七四年九月, 由於印度吞併錫金, 尼泊爾在其首都加德滿都舉行反印的示威遊行。它是惟一以官方的行動來表示對印度此舉不滿的國家²²。印度針對着尼泊爾的不友善, 突然宣佈對尼泊爾實施新貿易政策。在這個新貿易政策下, 嚴重損害到尼泊爾利益的是, 印度要求尼泊爾在雙方貿易時, 付給通行的國際價格而非一向雙方議定的印度價格(即三分之一的國際價格)。如此一來, 尼泊爾由印度進口的貨品務必要付出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價錢。由印度進口的五百種以上的商品中, 最重要的石油、水泥、煤、鐵及鋼²³都是尼泊爾缺乏而必須仰賴國外輸入, 以發展工業的必需品。儘管印度這一新經濟措施沒有陷尼泊爾於絕境, 但在尼、毛經濟關係已漸接近之時, 它們更有理由藉機進一步發展其「經濟合作」。例如: 一九七五年, 尼、毛雙方根據一九七三年比蘭德拉國王訪問北平時發展的聯合公報, 簽署了一項中共協助尼泊爾建築一條從博卡拉 (Pokhara) 到蘇爾克特 (Sulkaet) 的四百零七公里長的高速公路²⁴。這項協定對尼、匪的經濟關係是有重大意義的, 因為「它是一項從所未有在尼泊爾進行的外援計劃」²⁵。尼泊爾負責財政的國務大臣撒帕也曾表示: 「這是直到目前為止, 尼泊爾在一個友好國家援助下進行的最大工程, 這條公路對尼泊爾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特別是在我們地區發展的新戰略方面, 最大不過」²⁶。顯然的, 尼、匪經濟關係爲了對抗印度而有顯著的變化。

本(六)月二日, 比蘭德拉國王訪問中共大陸, 雙方在公開發表的講話中用了不少「增進友誼」、「友好合作」的字眼。但如果說比蘭德拉國王在這次訪問有些許值得提起的「成就」。那麼, 經濟方面應該是不容忽視的。由下面的二段談話我們可以得到證明。六月二日, 比蘭德拉國王在匪僞總理華國鋒爲其訪問而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提到「……經濟合作不斷發展是兩國關

係的特點……」²⁷。在那麼多可以合作的範疇裏, 他獨選經濟一項的合作加以提出, 表明他這次的訪問對經濟方面有特殊的含意。而僞總理華國鋒也在宴會上說到: 「尼、中兩國決定將中國西藏自治區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交通和其他有關的問題的協定延長十年」²⁸。由此可見, 雙方對經濟關係的關注。然而, 值得我們矚目的, 却是在華國鋒的談話中, 他同時提到: 「一九七四年, 比蘭德拉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 解除了逃往尼泊爾的一小撮西藏達賴叛匪的武裝, 徹底粉碎了破壞中尼友誼的陰謀……」²⁹, 這種說法實在是抹殺事實的。因爲, 當年比蘭德拉國王之所以解除逃往尼泊爾的康巴藏人的武裝, 實在是因爲中共威脅比蘭德拉國王, 如果不遵照中共所囑咐的做, 那麼它將停止與尼泊爾的貿易, 甚至不再協助建築自尼泊爾西北部穆辛德到中國大陸邊界的新公路³⁰。當時適逢印度對尼泊爾提出新貿易政策之時, 尼泊爾以一個低度開發的國家絕無法承受來自南、北兩強鄰對其同時施行的經濟壓力是可以了解的。因此, 比蘭德拉國王對於中共的威脅只有束手就範了。

中共既以經濟壓力爲手段於一九七四年迫使尼泊爾聽命, 則重演故技, 對中共而言絕不是不可能的事。因此, 比蘭德拉國王這次訪問即使得到中共的任何經濟援助、合作的承諾, 其可靠性或持久性應存着個問號。不可掉以輕心的是, 有朝一日, 中共在尼泊爾的經濟地位完全取代往昔印度所居的地位時, 難料中共不會爲自己本身的利益, 像印度一樣利用經濟的威勢來壓制尼泊爾。更可慮的是, 凍結了十五年的匪印緊張關係, 最近宣佈恢復大使級的正常外交關係。在匪、印關係至少表面上已解除緊張之時, 今後尼、匪的經濟關係一旦有裂痕, 那麼, 尼泊爾將面臨的窘困絕非今日只有來自南方印度的壓力可以比擬。尼泊爾怎麼可以不不做長遠的考慮, 而只圖眼前的依賴?

三 得不償失的這次訪問

中共以經濟援助開發中的國家, 一向持着的原則是: 「不因經援而算計經濟利益的收穫」³¹。因此, 比蘭德拉國王訪匪的意義對中共而言, 絕非純粹爲了經濟合作, 簽定些什麼協定而已。由中共邀請比蘭德拉國王的訪問只限於西藏自治區及四川兩地, 而自中共竊據大陸後, 西藏被視爲禁區, 被容

許往訪西藏者只限於受過週密調查過的自稱是中共的「朋友」^②來看，這並非是件尋常的事。此外，比蘭德拉國王是訪問西藏地區的第一位外國元首，而且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③。但這麼一次重要的訪問，費時前後九天，其訪問日程及節目却只包括參觀布達拉宮、大昭寺以及在拉薩市外的一些人民公社^④。由這種種跡象看來，比蘭德拉國王訪匪的重點絕不僅擺在經濟的拉攏而已。「經濟合作」可能只是一種煙幕，更可能是中共藉以控制尼泊爾的一種手段。

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運動發生後，尼泊爾成爲西藏難民的主要收容所之一。目前，尼泊爾境內的藏民約有六千人。這些藏民無視於貧窮、歧視以及經濟剝削等等的逆境。他們沒有人認爲尼泊爾政治變動會改變他們的一切，他們所有的寄托，完全在達賴喇嘛以及其流亡政府的代表們決定及行動上^⑤。顯然的，逃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是居住在尼泊爾境內的這一批藏民的精神支柱，同時對他們具有號召及影響力。

大陸陷匪後，西藏同胞抗暴的火焰未曾熄止過。今年（一九七六）四月中旬，拉薩地位又首先掀起了反抗暴政的怒潮^⑥。因此，西藏的治理問題早已使中共感到焦頭爛額了。單單在內部的鎮壓，當然遠不如雙管齊下，同時杜絕一切可能援助藏胞活動的外力。中共對使尼泊爾向其境內西藏難民採取行動遠較使印度來得有信心。因爲，凍結了十五年的毛、印緊張關係，直到最近才有和緩的跡象。目前，印度尚不會聽命於中共，而對達賴的流亡政府施壓力，這是可以想見的。然而，對尼泊爾的情形就不同。一九七四年，中共有能力以經濟的威脅，迫使尼泊爾對武裝的康巴藏族採取行動。自然它有信心再玩弄這個手段。同時，對尼泊爾而言，目前居住於其境內的藏民爲其行政管理上帶來若干的不便。因爲，這些人一直保存着原有的生活習俗以及傳統文化，與尼泊爾人疏遠而自成一集團^⑦。尼泊爾政府最近表示想將這些不同的種族融入其尼泊爾人的主流^⑧。假設，尼、毛雙方有意共同來解決尼國境內因藏人而引起的問題，而促成比蘭德拉國王此次接受邀請往訪，這並非不可能的事。只是我們由中共報刊的報導，並未見到雙方會就這個問題有所接觸。而由於雙方同時強調彼此的經濟關係，我們不難想見中共的深謀遠慮。儘管中共大事渲染其對尼泊爾的經濟援助，但考慮到它獨特（在共產國家中）的援外原則以及一九七四年以停止經濟援助威迫尼泊爾的作風，

可見中共的任何經援承諾都有其特殊的用意。以最近協助尼泊爾建築的博卡拉、蘇爾克特公路而言，它一直通到距離同印度邊界數公里的地方爲止，這條公路的戰略利用價值當然是不言而喻。再說，由於中共協助的全部公路建設工程由中共的部隊承擔。在公路完成後，他們當然有理由以再繼續保護和維修公路爲藉口而留下來^⑨。如此一來，中共協建的公路網愈擴大，則尼泊爾的處境將更令人擔心，是可預見的。

尼泊爾只圖眼前的利益，忘却了它再三申明的「不結盟政策」的真諦。比蘭德拉國王的訪問匪區，無異於與虎謀皮。儘管毛記報紙宣揚比蘭德拉國王此次訪問的成效，但尼泊爾因之而能獲致的真正利益，却是令人置疑。

註①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5, 1975.

② 聯合報，六十五年五月四日。

③ *The Guardian*, Sept. 20, 1969.

④ 大公報，一九七〇年七月五日。

⑤ 大公報，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⑥ *Hindustan Times*, Feb. 20, 1976.

⑦ *Hindustan Times*, April 9, 1976.

⑧ *New York Times*, Nov. 4, 1961; Dec. 9, 1961; Jan. 8, 9, 13, 1962.

⑨ Gaige, Frederick H., "Nepal: The Search for a National Consensus," *Asian Survey*, V. X, n. 2, Feb. 1970, p. 103

⑩ Gaige, Frederick H., "Nepal: More Problems with India," *Asian Survey*, V. XI, n. 2, Feb. 1971, p. 172

⑪ *Tibetan Review*, May 1976.

⑫ 聯合報，六十五年五月四日。

⑬ Bartke, Wolfgang, *China's Economic Aid*, N. Y.: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1975, p. 9.

⑭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6, 1971.

⑮ Rose, Leo 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Berkeley, L. 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8